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四

抗联风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四●

抗 战 风 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1987年合肥

封面题签 张恺帆
封底篆刻 郑家琪
特约编辑 方明治
 范泓
 曾晓辉
封面设计 马世云

抗 战 风 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15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212-00004-3/K1 印数：1—24000

统一书号：11102·87 定价：1.80元

前 言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一部气吞山河、威震寰宇的悲壮史诗。五十多年来，有关它的史料浩如烟海。本书着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以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为主要形式，反映我省抗日战争的某些侧面，勾画出这场伟大正义战争的历史画面。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安徽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始于抗战初期红二十八军和皖赣特委在岳西和浮梁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从此停止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枪声，开始了团结御侮的新时期。抗战初期成立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是我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张劲夫、章乃器、余纪一都曾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骨干。他们的回忆文章，介绍了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以进步势力为核心的抗日动员组织的状况，反映了在它的组织和推动下，全省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团结对敌、共赴国难的动人局面。

安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负责的、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在大江南北开辟的广阔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既相对独立进行，又在战略上互相配合。

驰骋在大江南北敌后地区的新四军二师、四师、七师是我省抗日战争的中坚。他们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淮南、淮北、皖中、皖南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是插在敌人要害处的一把钢刀。本辑发

表的张云逸、张恺帆、孙宗溶、朱农等同志的文章，再现了当年敌后战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充分反映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对于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的情况，本辑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军队和川军）在安徽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作战中，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省保九团团长江达元等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曾经英勇战斗，血洒疆场，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他们的错误指挥，导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本辑刊登的“立煌事变”，就是他们消极避战，祸害人民的典型一例。

由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策划的反共“摩擦”，是抗日战争中的逆流。1939年后，国民党曾先后两次发动反共高潮，特别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本辑发表的有关回忆文章，可以使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并加深认识“合则可以御侮，分则足以召亡”的历史教训。

我省的汪伪政权，在日军的卵翼下曾经存在过短暂的时间。本辑有一组史料，反映了它们的罪恶活动及伪官的可耻下场。书中反映日伪在他们的占领区血淋淋的罪恶统治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人民是怎样战胜了无数困难，踏过布满荆棘的征程，才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本书可以作为广大读者学习抗日战争史的辅助读物。通过学习抗日战争史，可以更深刻更具体地学到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永远摆脱了近百年来的屈辱和苦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发扬光大爱国主义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本书篇幅有限，用以反映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弊，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广

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1987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和概况	张劲夫(1)
我和高敬亭谈判的经过	刘刚夫(10)
我在安徽的一段经历	章乃器(22)
安徽省动委会概述	史维岫(30)
抗战初期皖南地区的国共合作	余纪一(45)
盛子瑾在皖东北同我党合作抗日的经过	孟戈非(52)

安徽抗日敌后战场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张云逸(64)
抗战初期的皖中工委	张恺帆(68)
皖中抗日根据地概述	蒋克祚(72) 王敏林
淮北抗日根据地述略	童天星(80)

安徽抗日正面战场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安徽战场	童志强(89)
阜阳保卫战	廖运泽(97)
稻堆山战斗	王玉森口述(101) 刘文远整理

抗战记事·····	刘兆口述 刘群整理	(104)
赵达元守卫寿县以身殉职·····	胡文涛	(107)
记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	李武德	(109)
立煌沦陷纪实·····	张义纯等	(120)
桂系基层行政改革简况·····	葛正权 牛青	(129)

党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与豫皖苏边区的统战工作·····	张学忠	(132)
淮北地区敌工工作若干情况·····	张文华	(147)
酃城起义·····	王子光	(165)

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经过的回顾·····	叶超	(177)
皖南事变后坚持皖南抗日游击战争概况·····	孙宗溶	(194)
皖南事变后坚持铜陵敌后斗争片断·····	朱农	(199)
半塔保卫战·····	郭述申 周骏鸣	(210)
皖东惨案回忆·····	王福伟	(219)

日伪统治区一瞥

汪伪“清乡”罪行录·····	张大荒	(224)
沦陷时期的安庆·····	郑克勤	(231)
汪伪安徽省长林柏生·····	汪春溪	(247)
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纪实·····	余乃蕴	(253)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 基本过程和概况

张 劲 夫

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主要是从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起到后来鄂豫皖区党委撤销止，大约两年左右时间。其中，又可分成三个阶段。开始是1938年3月底(或4月初)省工委成立到年底省工委撤销；第二阶段是成立鄂豫皖区党委到区党委从金寨撤退至庐江东汤池；最后是区党委组织大别山党员和进步力量撤退，到1940年春国民党桂系正式与新四军摩擦。

1938年1月，我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遣，从武汉绕道信阳前往安徽。临行前，长江局组织部刘顺元同志告诉我，安徽地下党组织已被破坏，要我去后恢复和发展组织，利用社会关系(我在上海地下党时认识一些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安徽省府在六安，我到后一个关系也找不到。后来，才和李世农同志取得了联系。3月和4月初，党先后派彭康和谭光廷同志到六安找我，传达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由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时在舒城)，我任宣传部长，谭光廷任军事部长，并在六安小东门六德公园旁租了房子作为工委机关。彭康同志带来的关系有曹云露同志(我到六安不久即见到他，但直到这时才正式接上关系)、新四军四支队民运队及兵站的同志，还有在舒城一带活动的地下党同志。工委下属组织有：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黄岩(刚从延安学习回来)；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曹云露；舒无特委，李世农兼书记，黄

本文根据作者四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育贤(桂蓬)任组织部长；太湖中心县委，书记孙毅。5月，省工委搬到立煌县的桃树岭(兵站所在地)。6月，日军由合肥进攻六安，占领了苏家埠、独山，工委机关又由桃树岭搬到白水河。7月，刘顺元、喻屏同志也被派来安徽参加工委，同时参加工委的还有黄岩同志、新四军四支队驻桃树岭兵站站长郑维孝同志等。这时，全国和大别山区抗日救亡的热潮已经掀起，形势很好，加上六安等县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所以党组织恢复较快。为了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舒无特委在8月间又分成两个特委，一个管庐江、无为等县工作，由黄岩负责；另一个管舒城、桐城等县工作，由桂蓬负责。

省工委的工作，总的说是执行中央和长江局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爱国进步力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当时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我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爱国人士、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都有进步、中间与落后之分，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而只是朴素地认为要把爱国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当时也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主要是通过动委会进行工作。动委会是当时安徽省政府官办的动员民众的组织。当时安徽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安徽地方势力，一个是掌握安徽地方权力的国民党桂系，一个是国民党蒋介石嫡系。三种力量相互矛盾，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局面。安徽地方势力与国民党当权派竞争很激烈，国民党内部的桂系与蒋介石嫡系即CC派的斗争也很尖锐。桂系想笼络地方力量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进而赶走CC派以独霸安徽。CC派当时控制着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府教育厅，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和省府教育厅长方治都是CC派分子。桂系则控制着安徽省政府以及在安徽的军队，相继由李宗仁、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把安徽政权交给桂系是不得已、不甘心的，因此，千方百计与桂系明争暗斗。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党当时采取的对策是团结地方进步力量，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对CC派则作为顽固派而与之斗争。

我们团结地方进步人士、联合桂系反对CC派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争取群众尤其是青年问题上，集中表现在利用动委会这个组织来团结爱国青年，发动群众。当时桂系迫于抗战形势，更主要的是为了在安徽站稳脚跟，不得不借助地方进步力量，成立了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动委会这个形式，山西有，叫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李宗仁在徐州也搞，叫战地民众动员委员会。李宗仁虽兼任动委会主任，但他不管事，开完成立会就到前线去了，日常工作由委员兼秘书章乃器代拆代行。章乃器是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被蒋介石逮捕过，是党发动群众斗争迫使国民党释放的。这次桂系邀请他来主持动委会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了省财政厅厅长，都是为了显示桂系与蒋介石不同，连七君子也敢用。动委会委员有省府各厅处负责人和地方开明进步人士。开明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有朱蕴山、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四位老先生，他们德高望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当时，朱蕴山任动委会总务部长，管经费，沈子修任组织部长，光明甫任宣传部长，常藩侯任后勤部长，只有一个情报部长由投靠桂系的原十九路军将领丘国珍担任。四位老先生和章乃器都是党的同情分子，党在动委会中有地下支部组织，各部都有党的小组，直接与我联系。各部中层力量大多是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如总务部的副部长童汉章，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党，这时虽脱了党，但后来又回到根据地来了。组织部总干事周新民是秘密党员，与董老直接联系，组织关系没有转到安徽，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党员。那时我以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名义作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可能知道我的身份，因此，他用人主要尊重我的意见，凡是我提出的意见，他都赞成，经过与几位老先生商量后贯彻下去，在组织部起的作用很大。宣传部总干事先是翟宗文，同情党，后是狄超白，是章乃器介绍来的，原是上海地下党员，后来恢复了党籍。后勤部总干事为朱子帆。主任干事大多是地下党员。干事中也有不少是党员。宣传部中有朱凡、胡竺冰（当时为进步人士，后来入党）、

翟宗文(后来当宣传部副部长)。后勤部主任干事史谦是地下党员。这样，在四位老先生之下，有周新民、童汉章、朱子帆、胡竺冰、翟宗文，又有狄超白、朱凡、许晴、史谦、汪胜文等。实质上是地下党通过进步人士，通过动委会这种组织形式，推动全省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地下党还利用动委会名义，办了一个训练班，在一处山沟(彭家湾)古庙中，由詹运生(地下党员)负责，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从以上情况看，动委会也可以看成是实际上在地下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统战组织。

动委会在省内各地组织成立了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抗敌协会，还在高庙办了妇女训练班，并在各县成立了县动委会，经费由省动委会发给。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由省动委会派人任指导员，掌握实际权力。这些指导员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少数是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动委会发动群众的具体工作靠工作团去做，当时省动委会派到各县的工作团有四十多个，还组织了几十个委托工作团，共有一千多人。工作团员都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发十几元生活费。地下党员大部分在工作团中，以团为单位成立支部，有的直接与我联系，有的与各地特委、县委联系。个别团内没有党员，但也尊重省动委会地下党的领导。总之，省动委会从组织上、经济上掌握了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此外，我们还成立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简称妇战团)，由孙以瑾同志任支书(第一任支书是胡晓风)，蒋岱燕任团长；还有少年抗日宣传队(吴道明同志负责)等组织。在上述的工作团、妇战团、少宣队中，除安徽本地青年外，有从江苏流亡来的爱国进步青年，如扬州、常州等地来的江上青、金涛等同志；有文化界流亡人士，如在舒城的柳乃夫、李竹平等同志；有浙江来的刘保罗、俞仲武等同志；有上海来的陈穆等同志；有从皖南来的陈国栋等同志；还有延安抗大、山东党组织派来的冯纪新等同志，以及天津、北平的流亡学生等一大批人。他们当中，经组织介绍的党员，我们都分到各工作团当团长和县动委会当指导员，或派往动委会办的

及桂系省政府举办的干训班当队长和指导员。有些党员和靠近党的进步人士，被派到章乃器的财政厅及各地货物检查处(税收机关)工作。这个时期，群众发动得相当快，宣传动员工作十分活跃，唱抗日歌，演抗日戏，组织群众锄汉奸，支援前线抗战部队。从省到县，整个宣传工作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国民党嫡系吃不开。方治办了一个《皖报》，我们就推动桂系办了个针锋相对的《大别山日报》，并派去几个地下党员当编辑。《大别山日报》社长是桂系派的，但总编辑靠近我们党，有一个副刊由我们主办。我们还开办生活书店分店，公开发行进步书刊。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武汉出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当时在大别山区广为传播，连广西军队内部也有人阅读。总之，党在动委会的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团结了群众，团结了当地爱国力量，团结了桂系内部的进步人士，争取了桂系和地方进步力量共同与顽固派作斗争，打击了CC派的气焰，使其难以捣乱，不能插手动委会工作。CC派想抓权，结果只抓了几个临时中学。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迁到重庆，原来由其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安徽省工委，在组织形式上已不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长江局根据中央精神，决定成立鄂豫皖区党委，领导湖北省东北部、河南省东南部以及安徽省西部的工作。何伟同志在10月份以新华社记者身份由湖北来到立煌，传达了长江局的这个决定。但区党委正式成立则在1938年年底郑位三、郭述申同志到立煌之后，时间大约在1939年的一、二月份。郑位三任书记，何伟任常委、组织部长，彭康任常委、宣传部长，我任常委、民运部长，谭希林(延安派来)任常委、军事部长。为了便于工作，区党委民运部下面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少景)、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孙以瑾)；宣传部下面成立文委(书记朱凡)。这三个党内机构，运用省动委会的公开合法组织开展工作。由于我在动委会内有合法身份，所以文委的许多工

作也是和我联系较多。广西军队和广西学生军内部的工作和桂系省府内地下党的工作，也是直接和我发生联系的。同省工委相比，区党委委员增加了很多，有方毅、黄岩、冯纪新、周晓乐(豫东南特委书记)、郑维孝、程坦等。区党委由中原局领导，中原局书记为刘少奇(化名胡服)，组织部长为朱理治(化名皇岗)，机关设在河南确山新四军八团留守处。中原局对区党委的指示，电台联系较多，有时也派秘密交通来。至于区党委给中央和中原局的书面报告，位三同志在时有一些，内容记不清了。附带说一下，在工委时，彭康同志就曹云露的问题给中央写过报告。曹云露同志运用桂系皖北行署合法关系来搞武器是正确的，但坚持原则不够，犯了一些错误，后来调到鄂东北特委工作。这位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有功劳的，后来在反摩擦斗争中英勇牺牲了。区党委成立时，日军已占领了淮南路，于是我们又以淮南路为界线，在路东成立了皖东省工委(或省委)，成员有刘顺元、方毅、李世农、谭光廷、喻屏等，负责开辟敌后工作。路西的大别山区这时仍是桂系势力范围，不是敌占区。因此，区党委在淮南路西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争取抗日爱国力量，发展党组织，在桂系内部发展地下党组织。至于发展武装，只是在无为、庐江、桐城沿江靠近敌占区的游击区做了一些工作，发展不快。当时组建的武装，后来编为江北游击纵队，这是由无为等几个县的游击队合编组成的，由新四军军部孙仲德同志任司令员(孙原与曹云露一起在合肥一带打游击，到延安学习后调到新四军军部)；有方毅、张体学在湖北黄冈组织的五大队；有桂林栖(黄梅县委书记)组织的八大队(成立不久即被顽固派打垮了)；有程坦同志领导的七里坪留守处的少数留守队及河南的同志在铁路上组织的铁路工人游击队。五大队及程坦同志的这支队伍后来成为五师的基础，而江北游击纵队加上皖南事变突围到江北的少数部队，后来发展为七师。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年底，掀起第一次反共

高潮。7月份，中央和中原局来电指示，估计桂系也会跟着反共，应该将大别山区地下党和进步力量转移到皖东和皖东北新四军活动地区内，区党委机关也要转移。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区党委在白水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退。7月24日，区党委四名常委郑位三、彭康、谭希林、我开始分两批从立煌白水河转移到庐江东汤池，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住在一起；另一名常委何伟同志以新四军参议和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暂时留在立煌部署其他同志的撤退工作。9月份，区党委在东汤池开了一次党代表大会，主要是选举七大代表。何伟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并决定将鄂东北、豫东南工作交给李先念同志领导，又派李丰平同志去立煌，成立立煌市委，领导地下工作。李丰平同志任市委书记的时间是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以后桂系公开反共，他来不及撤到庐江，就同电台一道北撤到彭雪枫的六支队。总起来说，这次撤退是有组织有计划的。1940年春，桂系公开反共，我们的同志已基本撤完，包括四十多个工作团、广西学生军和桂系军队内的地下党员和靠近党的爱国青年，以及省干训班、省府各厅的一大批进步人士在内，总数达三千人。其中，仅桐城县就将近有五百人撤到解放区。留下的少数同志如詹运生、史谦等，后来因组织被破坏而被桂系活埋了。转移到根据地的同志则有的成为淮南、苏北、皖东北根据地地方工作的干部，有的参加军队，充实了部队干部力量。

上面说的，大致上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和概况。这个基本过程说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1938年，成绩是主要的，动委会、工作团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当然，问题也有，概括地说：（1）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2）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是运用动委会这个合法组织，从而团结了广大群众，进行了抗日；（3）工作偏重城镇，偏重知识分子，宣传教育多，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工作抓得不力（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抓住日军进攻六安时，在六安、合肥一带放手发

展武装，失去了一次有利时机)，主要是争取民主人士，在桂系内部做争取工作，并帮助地方上一部分爱国人士组织了一部分自卫大队武装。

1939年12月，新四军四支队主力在定远藕塘一带活动，中央通知我们向主力靠拢。我们去了，参加了少奇同志召开的座谈会，听了他的分析，才明白在前一时期工作中，我们没有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敌占区去放手发展革命武装，以我为主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有教训的。少奇同志在座谈中指出，抗日要有枪杆子，要有武装，要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是没有家，靠讨饭吃，怎么抗日？不要什么都经过统一战线，都要国民党批准，难道他们不批准就不抗日了吗？蒋介石在庐山说过：“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既然抗日人人有责，我们就不应该缩手缩脚，他不同意，我们就自己委派司令、委派县长，一切为了抗日嘛！少奇同志这么一说，我们恍然大悟，我们应该早一点把大部分力量放到敌占区和敌后去，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创立根据地，而不是在桂系势力范围内建立政权，那样做是要打内仗的，抗战是不能打内仗的。但在敌占区、在敌后这样做，我们是有充分理由的。

1940年1月，成立路西省委（彭康任书记）、路东省委（开始由我任书记，2月份我调新四军五支队任政治部主任，书记由方毅担任，后由刘顺元同志接任）。3月份，桂系军队进攻，自卫还击战开始了。当时，四支队在路西，五支队在路东。我们部队少，桂系则来了好几个团，东边还有韩德勤的部队，怎么办？我们针锋相对，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自卫还击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路东来安县据守半塔集。罗炳辉等同志则带主力去路西会同四支队主力在大桥、藕塘、得胜集一带首先把桂系军队击退，站住了脚，接着又回师把路东的韩德勤赶走。半塔保卫战是新四军战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战役，领导和指挥这次战役的有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徐海东等同志。我也参加了。由于反击胜利，4月上旬，路东、路西

两块根据地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次桂系进攻，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党的对策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根据地，不仅建立起来站住了脚，而且在巩固中不断发展。

（原载《安徽文史资料》第25辑）

冯玉祥先生的座右铭

抗战期间，蒋管区物价飞涨，不贪污、不害民、仅凭薪俸维持生活的冯玉祥，虽是身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高位，生活却十分艰难，家中常以咸菜下饭。此时，他写了一幅座右铭悬于室内以自励，文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头可断而志不可夺，身可杀而国仇不可不报。此之谓大丈夫。”